

我亲爱的堂兄钱学森怀着对祖国人民深深的眷恋之情,静静地走了。他对祖国人民的这份情、这份爱就像一团永不熄灭的圣火,始终在他胸中燃烧,并化为壮我中华、富我民众而奋斗不息的力量。中国今日之强大是和以钱学森为代表的 一代英杰的无私奉献分不开的。

连日来,我悲痛欲绝,泪如泉涌,多少话不知从何说起,暂以一段往事的回忆,聊寄我无尽的哀思。

钱学森非常钦佩那些不等不靠敢于与贫穷落后做斗争的普通百姓,我时常见到他每谈起这些事情就心潮起伏,极为动情。记得那是 1994 年 2 月的一天,北京乍暖还寒,钱老约我们几个人来到他的身边。我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开门见山就和我们谈工作、谈学术、谈他正在思考的一些艰深的科学问题,所以我在他的客厅里刚一坐下,就急忙打开笔记本准备速记;没想到,这一次他老人家一开口和我们谈的竟是一座真山、一座大山——太行山。

他手指着《人民日报》上穆青的长篇报道《两张闪光的照片》让我们看,只见照片上的人都是用一根绳索捆住自己的腰部,吊在悬崖峭壁上,手中紧握着长长的撬杠,仿佛正在踢来荡去。我不觉为之捏了一把汗,心里想,太悬了,这人不要命啦!怎么回事?只听钱老说:“这是一篇关于‘红旗渠’的报道,作者穆青多次去太行山,他和当地农民感情很深,所以写的东西真实动人。”我知道钱老对穆青一直都很赞赏,他最喜欢读穆青笔下的“焦裕禄”、“王进喜”等英雄人物篇。

钱老接着说:“‘红旗渠’这件事情过去咱们都听说过,昨天我反复读了这篇通讯报道以后,想了很多。你们看,林县的 60 万农民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顽强战斗十个春秋,硬是用双手握住撬杠,镐或钎奋力劈开了太行山,从 70 多公里以外的山西省引开漳河水,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穷困面貌。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说到这里,钱老好像又看到了林县农民们在县委书记杨贵的带领下,正在奋战的情景,从而为他们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排除万难、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深深地感动着。

提起“红旗渠”,我记得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这是新中国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但是,当我把目光从《两张闪光的照片》移到钱老的脸上时,我发现在他那由于过分激动而泛出红晕的脸上掠过一些倦意,好像是缺觉了。噢,他一向早睡早起,睡觉质量很高,为什么没睡好呢?我猜想可能是昨晚他读了“红旗渠”以后,思绪万千,彻夜难眠,不仅为林县农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所感动,也为曾经陷入苦难的农民兄弟而动情了……

果不其然,钱老指着照片上的一个人继续给我们介绍说:“他叫任羊成,当时因为每天吊在悬崖上清除山体爆破后的险石,腰里都勒得血肉模糊了,他们就是这样不怕苦、不怕死地干的 ……”当我再一次盯住这两张闪光的照片仔细观看时,只听得钱老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语调沉重地说:“农民太苦

钱学森的百姓情怀

钱学敏

了!过去林县这个地方山高坡陡,土薄石厚,十年九旱,吃点水都要来回攀爬几十里山路,种田当然很困难,能有糠菜半年粮,就算好年景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使得这里的不少农民都得了皮肤病,‘大脖子’病、食道癌等地方疾病……”钱老的语音渐渐有些低沉。

我惊叹钱老对林县百姓的苦心竟是如此地了如指掌,禁不住自言自语地随着他说:“看来他们那儿缺碘,又长期缺医少药,唉,农民活得太苦了!”钱老点了点头,更为动情地说:“遇到大旱年景地上颗粒无收,许多农民就在这荒山野岭里慢慢地冻饿而死了。”话音未落,他哽咽了,只见钱老抬眼望着阴冷的窗外,仿佛听到了百姓沉痛无奈的呼声,探测到人民苦难的深渊,心里十分难过,禁不住眼里滴满了泪水。

我不由得心头一颤,说实在的,钱老这位“两弹一星”的元勋、世界级的大科学家,虽一向比较严肃,但也是个乐观的人,我们在一起时总是兴致勃勃地谈今论古非常快乐,没想到这一天,当他老人家触摸到普通百姓的疾苦时,竟流露出如此深切动人的情怀,我一时不知所措,便慌乱地安慰他说:“现在他们都好过了,有了‘红旗渠’他们吃水种地都不愁了……”再往下,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那一刻,我们都沉浸在林县农民曾经的海里,许久,大家默默无语。

可能是因为杨经亲身感受到过钱老对普通农民的深情与关注,以及他对“红旗渠”精神的高度赞扬,五年后的一个秋天,忽然得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红旗渠精神》大型展览会,我立即放下手头一切事情,急急忙忙赶往天安门东侧的展览大厅,想近距离地再一次接受这伟大精神的洗礼。

展览大厅里回荡着“定叫山河换新装”的背景音乐,展厅四周布满了历史照片、部分实物、沙盘模型、录音录像等展品,谱写着林县人民在共和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里“肩负起人民重托”、“千军万马战太行”等的动人篇章。

当我认真听取讲解员讲解时,忽然发现这位老讲解员与背后展示的相片上那位抡着大锤的年轻姑娘长得很像,便禁不住冒昧地问了一声:“你就是那位铁姑娘队长郭秋英吧?”没想到她淡淡地一笑,默认了。顿时,展厅里响起一片惊叹之声,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她那张黑红的笑脸上。

然后,我随着观众在林县人劈山凿渠时用的工具、穿的服装等实物之间慢慢移动着,蓦然抬头看去,啊,多年以前钱老给我们看的那“两张闪光的照片”,正大大地张贴

在展厅的北墙上! 照片前有十几位观众和记者围着一个 60 岁上下的男子;这男子一脸英气,正在比比划划地讲着什么。这时,突然有人惊喜地喊道:“任羊成!任羊成!”我赶紧凑上前去一看,呵,这就是全国劳动模范任羊成!我暗自庆幸不虚此行。

当我最钦佩的人忽然出现在眼前时,不知怎的,我心里特想看看他腰部的伤疤,问问他那一圈“老茧腰”是否已经长好?这时,可能早已有人向他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只听见这位朴实的农民谦虚地对大家说:“没什么,没什么。”他边说边快步走着,我紧紧跟着他,仔细端详他那副坦然无惧的样子,不禁暗暗地思忖,人们都说:“除险英雄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而他舍身抢险十年后,仍然英姿焕发地站在这里话当年,很可能是因为他浑身是胆,阎王爷也惧他三分,不敢收留他。真是个可敬可爱的人啊!

接着,我独自停留在林县农民开凿“红旗渠”的录音、录像里时,整个身心被这种为了摆脱穷困而团结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强烈地震撼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观看,希望这种可贵的精神能够永远融入我的心灵,带我走向崇高的境界,因而,久久不愿离去。

直到傍晚,成千上万的观众已逐渐散尽,这时,我忽然看见从外面走进一位身材高大、满头银发的老人,他身着整齐的中山装,腰板挺直,精神矍铄。大厅里的几个工作人员立刻迎上前去,恭敬地陪着他顺序参观。我也悄悄地混入其中,想最后再听一遍讲解员的动人解说。没曾想,那位身着红色衣裙年轻秀丽的讲解员姑娘仰望望着老人,怔怔地叫了声“杨书记!”就不好意思讲下去了。

我一听她叫“杨书记!”嘴里不知不觉流出了心中的话:“是林县委书记

记杨贵?”旁边立刻有个声音纠正我说:“不对,他是安阳市委书记!”我无心争辩,正在纳闷,没想到这位高个儿的白发老人很快低下头凑到我的耳边小声说:“我是安阳市委书记兼林县委书记。”他故意在“兼”字后面停顿了一下,说完,我们都笑了起来。原来眼前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就是钱老深深敬仰的老英雄杨贵啊!

我脑子里立刻回想起杨书记那句“头可断,血可流,修不成水渠誓不休”的铿锵有力的誓言,也闪现出他年轻时戴着黄色安全帽,穿着蓝布装,扛着大铁镐,带领大家风餐露宿、劈山筑渠的情景。我激动极了,好像是“追星族”遇到了自己最崇拜的偶像,寸步不离,总想从他那伟大的精神宝库中再多淘些珍宝。

无奈,天色已晚,我只得依依不舍地走出了《红旗渠精神》展览大厅,抬眼望去,只见长安街两旁华灯初上,犹如千万朵白玉兰含苞待放,映照着中南海的绿树红墙,我的耳畔仿佛又一次响起了钱老那句至理名言:“中国人很聪明,又最能吃苦,只要领导得好,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

此时,我也更深切地感受到了钱老无尽的情与爱早已和这块多难的土地、英雄的人民融合在了一起。所以他能够为了使祖国摆脱贫穷落后和苦难,使中国人民过上尊严的生活,而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奋斗一生,奉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



钱学森肖像(油画)

郑毓敏

与我直接通一次电话。”

14 时 30 分,李旭阁跟随张爱萍来到距离爆心 60 公里的白云岗。观察所设在一个土坎堆前,李旭阁环顾左右,发现他们请来的新疆军区与自治区领导人王恩茂、赛福鼎、郭鹏皆在场,而核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朱光亚等一批人已在零时前几分钟,走进了观察所掩体里。背对核核心,向背而卧。

李旭阁曾说,为了看到原子弹爆炸的瞬间,可以豁出去一只眼睛,也在所不惜。张爱萍摇了摇头说,旭阁,勇气可嘉,决不可蛮干,通知所有人坚决不许面向爆心。

距离 15 时越来越近。倒计时秒表在咔嚓作响,李旭阁的心禁不住一阵狂跳。随着指挥员倒计时报数,只听一声起爆口令,死寂的戈壁滩上遽然掠过一片耀眼的白光,远处传来一声轰隆隆的雷霆巨响,大地震颤了。遥远的天边,一个火球缓缓裂变,红云般的蘑菇浮浮冉冉,冲天而起,扶摇苍穹,飓风席卷天地。一会儿红色蘑菇云在半天中漫漶翻卷,次第成乳白色。白云悬空,美丽的毒蘑菇绽放天地之间。李旭阁欣喜如狂,却没有忘记将手中的电话递到张爱萍手中说:“总理就在电话之中,他在等你报告情况。”

张爱萍此时却难以抑止内心的激动,说:“总理,首次核爆炸成功啦!”

“不是真的核爆炸?”周恩来在电话里问张爱萍。

张爱萍扭头问身边的核科学家王淦昌,“总理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是核爆炸!”王淦昌肯定地回答。

张爱萍立即向总理作了报告。周恩来说:“很好,我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参加首次原子弹研制和试验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祝贺!”

首次核试验尘埃落定。当天晚上,庆功宴过后,张爱萍忧心忡忡地说,旭阁啊,也不知那铁塔炸成了什么样子?

李旭阁沉吟片刻,主动请缨道,“张副总长,我明天坐直升机飞到爆心,从空中看看铁塔倒塌的真实情况,回来向你报告。”

“不行!太危险。”张爱萍摇了摇头,“现在爆心核辐射和核沾染超标千万倍,对身体危害太大!”

“科学家们说没事,只要防护得当。”李旭阁毫无畏惧地说,“我穿上防护服,戴上防

这些天,因为“中国航天之父、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的仙逝,各家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钱老的生平和事迹。在众多报道中,有一批钱学森写给他的外甥女、天津大学物理系陈天伦教授的书信,读来十分感人。

有一封信很短,全文不过百字,看后却令人怦然心动:“我很高兴听到您一家在当前高等院校纷纷搞‘创收’的环境中,竟能‘安贫乐道’,‘以不变应万变’,真我中国知识分子之本色也。让我对您和您一家表示敬意。”在这封写于 1988 年底的信里,钱老对外甥女一家在市场经济大潮袭来时,不跟风搞所谓的“创收”,专心搞业务,安贫乐道的做法表示了自己的充分肯定,认为这是“真我中国知识分子之本色也”。

安贫乐道,是中国百姓自古以来称颂的美德,道就是主张、思想、学说。意思是安于贫困生活,以守道为乐。《论语》:“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大概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早的安贫乐道典型了。孔子的弟子颜回家境贫困,身居陋巷,缺吃少饮,别人看了很忧伤,而颜回却认真且快乐地读书,沉浸在遨游知识海洋的快乐之中。《后汉书》又向我们介绍了杨彪的安贫乐道:“安贫乐道,恬于进取,三辅诸儒莫不慕仰之。”东汉名臣杨彪,世代忠烈。任京兆尹时毅然处死宦官王甫。献帝时为太尉,董卓欲迁都长安,百官

无敢异议者,唯其力争,免官。卓死复为太尉,李郭之乱中尽节护主。后为曹操所忌,诬以大逆,孔融力救始免。后其子杨修为曹操所杀,闭门不仕十余年。孔融说:“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晋书》称赞刘兆“安贫乐道,潜心著述,不出门庭数十年。”“安贫乐道”亦作“安贫守道”。大文豪苏东坡在《荐布衣陈师道状》中说:“臣等伏见徐州布衣陈师道文词高古,度越流辈,安贫守道。”

1988 年,正是中国市场经济大潮袭来之时。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在这个大潮中的不和谐音就是“一切向钱看”,就连一向被称为“净土”的高等院校,也出现了以各种名目“创收”的不良风气。而钱学森的外甥女陈天伦一家,不为外界环境所动,安贫乐道,专心教书育人,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色,钱老对此

表示了自己的敬意。

其实,钱老自己就是一个安贫乐道的典型。钱学森祖籍浙江杭州,从小就很有志气,5 岁就能读懂《水浒传》,立志长大后也做英雄,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在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从研究员一直当到教授。照理,钱老一家在美国的生活是相当不错的,可是,当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1955 年 10 月,毅然带全家返回祖国。他牵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958 年完成了东风导弹计划,并且在 1964 年试射成功。而 2003 年成功将“神舟五号”送入太空的“长征”火箭,也是在钱学森研究的基础上开发的。很多人都说,是钱学森点燃了中国的强国梦想。

钱学森的近亲陈天山,他的外公与钱学森的父亲是亲兄弟,他说起了一件往事。他说:“当时的钱氏大院在杭州东街路,钱氏大院以前有 3 万平方米,住的都是钱家的人。这个大院后来拆掉,分给我们的房子,钱学森也分到一套,我当时写信给舅舅,他回信说,我是无产阶级,我不要房子。”他说,钱学森平时很节约,可国家要赔给他房子,他却不要。上海交大档案馆原馆长曾勖良教授也说起一件往事。当时上海交通大学要成立档案馆,曾勖良负责收集校友资料与实物。他问钱老有什么东西可放在档案馆,钱老说,他不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就给了曾勖良

两支铅笔和一个本子。曾觉得不够,就左看右看,看到墙上挂着一只很旧的公文包,就说好不好把公文包给我?钱老不肯,说这只公文包他已用了 50 年了,现在也还要用。曾勖良说,那时是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钱老给人的印象是非常节俭,他起草文稿,都是写在废旧的挂历背面或会议材料的背面。作为一个大科学家,这样做确实十分难得。因为,在钱老的心中,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色就应该是安贫乐道,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国家和人民。如今,一代科学巨匠已离我们而去。但是,他那种安贫乐道的精神,却长留人间,继续照耀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情系西北工大

李小聪

王凡华

在许多 people 眼里,钱学森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而且是对科学家全部含义的诠释。在西北工大师生产心里,钱学森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一个航天科技领域的领导者、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师,更倾注了一段与西工大难舍难离的情缘。

1956 年 10 月 8 日,在钱学森归国一周年时,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1957 年 2 月,周总理签署国防部院令,正式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第一任院长。此时的国防科技事业百业待举,急需专业人才。培养人才,自然首先考虑的就是学校。作为早期中国航空工程教育的一个亮点,刚刚成立不久的西安航空学院(后为西北工业大学)“师出名门”,精英荟萃,吸引了钱学森的重点注意。

他欣然为西安航空学院师生们题词:“在你们这一代里人们一定会开始星际航行,这是航空技术的方向。但是我们国家现在还是一个文化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我们的家庭是薄的。怎么样才能很快地而又现实地赶上去呢?这是你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1958 年,学校应时而动,率先在全国成立了宇航工程系,是我国最早的宇航院、系之一,后发展成为航天学院,已形成从本科生、硕士生到博士生以及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50 多年来,学校不辜负钱老的嘱托,参与了“神舟系列”飞船 1 号到 6 号的研制任务,是“为中国

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做出贡献单位”的两所高校之一。一系列成绩的取得,与当年钱老的殷切关切密不可分。

今天,中国是继俄美之后第三个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航天大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出舱关键技术国家。我们在赞叹钱老高瞻远瞩的同时,也深深地为钱老所提出的问题而感慨。钱学森终究是一名科学家,在花费 30 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国家交给他的重大历史使命以后,这位“科学元师”甚至对他身边的秘书说过:其实,搞“两弹”这种工程项目是组织上的任务,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的兴趣是在学术领域,是在思想上的创新。

的确,这位中国的航天专家不仅是一名技术专家,还被认为是一位文、理、工复合型的科学家。西北工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退休教授傅正阳曾经“享受过”钱老的三次亲笔回信和一次三个半小时当面谈的高规格“礼遇”。他深情回忆道:“钱老师的谦谦君子之风和对研究生教育的真知灼见让我们很感动!”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钱老留给西工大人的思考——创新,是摆在西工大师生面前几十年一以贯之的主题。西北工业大学一定不负钱老的期望,为中国现代航空、航天工程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